

被放逐的邊緣話語——

解讀建國初期文壇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

◎ 陳偉軍

規範期刊運作、管理，是構建社會文化秩序的一個重要方面。新中國成立後，一種新的文化生產機制逐步形成，它根據時代的需要，造就了一系列無形的規範，對期刊乃至整個出版事業實施引導，以形成有利於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社會文化語境。

建國初期，新的文學、文化格局處於形成之中，對文藝刊物的整頓、調整、改進在大刀闊斧地施行，刊物運作漸漸被納入高度「一體化」的組織方式。然而，處於強勢地位的主流話語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來自文藝界的質疑，胡風等一些理論家、作家發出了「異端」的聲音，顯示出來自邊緣的對話仍然是存在的。本文試圖通過對胡風等人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的梳理，從一個側面透視建國初期文學生產模式、輿論環境和文化生態的獨特之處。

新中國傳播機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國家對報紙、期刊、書籍等實施監管，以發揮媒介在建構社會秩序和權威時不可替代的作用，確保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在出版領域建立起來。國家對期刊的監管，是與社會的整體結構變化相適應的。政權的更迭催生新的文化體系、控制模式形成，每一種期刊的合法性同時必須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檢驗，這主要表現在對辦刊宗旨、編輯方針、內容品質等的內在規約。就文藝刊物而言，它必須把保持政治敏感和思想警覺放在首位，以符合特定時代文化整合的要求。建國初期，文藝雜誌的體制化過程與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幾乎是同步進行的。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藝界召開了整風學習動員大會，胡喬木在會上作了題為《文藝工作者為甚麼要改造思想》的報告。報告指出：「目前文藝工作中的首要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確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和幫助廣大的非工人階級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的問題。」¹會上，周揚和丁玲也分別作了題為《整頓文藝思想，改進領導工作》和《為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鬥性而鬥爭》的報告。這兩個報告從不同角度強調了文藝界整風的必要，包括改進文藝領導工作和整頓辦刊方針等。丁玲在報告中說：「我們還有很多人用一種傳統的觀點、舊的觀點去對待我們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夥人的事。過去一小夥人掌握了一個刊物（即是所謂同人刊物），發表這一夥人的思想，宣傳這一夥人的思想，反對一些他們要反對的，也慷慨激昂過，也發牢騷。這些刊物有的曾經因為被進步人士所掌握，當時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有的編輯部裏因為有共產黨員，曾反映過一些黨的政策。但這種辦刊物的辦法，已經過時了，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已經處於另外一個嶄新的時代了。我們已經是主人，國家和人民需要我們的刊物能擔當思想領導的任務，能帶領群眾參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鬥爭，並且能引導和組織作家們一同完成這個任

務……。」²丁玲明確提出同人刊物的時代已經結束。這也意味著，「五四」以來《新青年》編輯部同人所開創的文化傳統，在意識形態高度一體化的語境中難以為繼，「自由表達」將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理論家、作家不可能沒有感受到。以胡風為例，他在1949年就致信給南京的路翎談自己對辦刊物的想法，並讓路翎轉告正在編輯《螞蟻小集》的化鐵和歐陽莊：

「刊物，暫不必弄了，也不可能弄罷。如莊兄被要求弄，那是另一回事。」³作為主持過《七月》、《希望》這兩個分別可稱為半同人雜誌、同人雜誌的胡風，預料到了社會整合中媒介領域將要發生的深刻變化。在胡風看來，《希望》式的同人雜誌難以適應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要求，其價值屬性必然被重新評判。因此，他意識到，只有作為地下黨員的歐陽莊如果被要求創辦雜誌，那麼刊物才具有「合法性」，其同人性質也隨之發生改變。事實說明胡風的預見是正確的，大陸原有的文藝刊物在建國前後都陸續停刊了。而新辦同人雜誌，也不會有更好的命運，最典型的要數胡風的夫人梅志跟路翎等人創辦的《起點》，該刊獲准登記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然而，《起點》根本無法打開發展的局面，主管全國私營文藝期刊發行工作的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拒絕發行這個刊物，因為北京的總店有吩咐，「叫他們不要賣」，刊物才出了三期就要停辦。《起點》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宣告它即是同人雜誌的終點。1953年7月，胡風在全家遷往北京之前徹底結束了「希望社」的業務⁴。「希望社」的節餘和全部紙型移交給了國家出版機構。

作為有著自己獨特文學觀念與文化追求的理論家、編輯家，胡風曾以《七月》、《希望》等雜誌為陣地，影響、培養了路翎、丘東平、彭柏山等一批作家。胡風的編輯思想，繼承發揚了「五四」以來啟蒙主義期刊的傳統，表徵為對文學、文化發展與社會歷史進步的深切關懷。早在1936年，他在《文學修業的一個基本形態》一文中，主張同人刊物「應該廣泛地吸收周圍的愛好文學的分子，一方面擴大團體的基礎，一方面也就是擴大接觸人生觀感人生的機會。」1938年4月29日，胡風主持了《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既是與文藝界人士討論《七月》雜誌的性質與發展問題，也是向社會、向文藝界表白他的期刊設計理念：「我所說的『同人雜誌』是指編輯上有一定的態度，基本撰稿人在大體上傾向一致說的，這和網羅各方面作家的指導機關雜誌不同。第一，我以為用一個文藝態度號召作者讀者，由這求發展的雜誌，對於文學運動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採取這個方向，恐怕很難得開始。第三，《七月》也並不是少數人佔領的雜誌，相反地，它倒是盡量地團結而且號召傾向上能夠共鳴的作家，盡量地尋求新的作家，例如開始沒有寫稿的作家現在寫得很多，如東平、艾青等；許多新作家的出現更不必說了。這是一個方針或方向的問題，我平常談話的時候，是使用『半同人雜誌』這個說法的。」⁵無論是同人雜誌抑或半同人雜誌，這種對於期刊屬性的定位，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而富有個性特徵的文學期刊，是組織文學社團、形成文學流派必需的手段。像《小說月報》、《新青年》、《現代》、《文學》等等期刊，中國現代文學正是以這些刊物為重要陣地，展開其多元化的探索、追尋。

毋庸置疑，建國後一段時間，帶有「流派」、社團色彩的期刊是不允許出現的。這時期的文學刊物與作家創作，還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胡風從自己的文學主張和編輯理念出發，對建國初期文壇的狀況及文藝期刊的運作表示不滿：「看一看情形，真是空虛得很，一個《人民文學》，都苦於沒有文章，一個《報》，也是七拼八湊，這中間又急於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殺人，做盡了壞事，你看，這能成甚麼氣候？」由此，胡風診斷「一體化」文學生產模式的弊端，對文學、文化的發展前景深表憂慮：「屠殺了現在者一定也屠殺了將來的」。

更令他苦悶的是，知識份子的獨立聲音缺乏公開表達的管道，只能私下交流：「這些話，不足為外人道的。」⁶

在文學期刊「大一統」的模式中，胡風的出版期望註定無法與當時的辦刊方針同步。建國初期，有關領導人提出《文藝報》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個負責崗位讓胡風選擇，而胡風出於某種顧慮沒有接受分配，以後一直蹉跎下來了。到1954年，《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因「壓制新生力量」受到《人民日報》的「質問」，接著一直檢討到1957年被劃為「右派」；胡風在對他的大批判前夕，帶著僥倖的口吻說：「要是我就了那個位置，會比馮雪峰垮得還快還慘。」⁷然而，胡風的文學理想和出版信念並沒有泯滅。羅洛在90年代接受訪談時回憶道：「說到五十年代，胡風最大的心願，給中央寫了三十萬字，就是為了有一個自己的刊物，但一直沒實現，後來倒因此而受批判了。他反對機關刊物，他想實行主編制，按自己的意願編刊物，而不願受作協、文聯的領導。」⁸

在《三十萬言書》（《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中，胡風對現存的所謂「國家刊物」、「領導刊物」、「機關刊物」以及全國各大區刊物提出了嚴厲批評，建議有領導地予以取消，同時解散中央和大區各級行政管理的創作機構。他認為，這些刊物的編輯和審閱工作，大多數是由沒有經驗而且政治和藝術水準不高的青年和被「培養」出來的「文藝幹部」進行的，作家們成了由編輯部裁決的物件，造成了普遍的不滿。因為這些期刊「都是獨佔性的」，擁有壟斷的地位，它們不可能鼓勵進行真正的作品競賽，「反而成了一呼百諾的壓死了思想鬥爭的局面」，「成了主觀主義或機械論的基本障地，形成了一堵『銅牆鐵壁』」。胡風主張重建新的傳播話語空間，創刊若干個群眾性質的會員刊物，每一個刊物都是「一個勞動合作單位，絕對排斥任何行政性質（包括服從多數）的工作方式」。從一種開放性的立場出發，他強調「以保證創作條件，推動創作實踐為中心環節」⁹，推動刊物良性發展，編輯工作崗位不能限制發表自由，刊物主編與主編之間可以商談交換或介紹稿件。他還建議，為了「保證創作實踐能在更廣泛的思想鬥爭的基礎上爭取發展」，「應建立幾個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容納「可以出版但水準不高或審稿人把握不定的作品」¹⁰。胡風提出的發表原則，實際上超越了狹隘的話語立場，體現出一種相容並包的精神。

胡風從創作的規律出發，試圖對當時文學單純政治化的走向進行糾偏。他提出「在三年之內逐漸廢除供給制和薪金制，作家達到以勞動報酬自給，刊物達到企業化或半企業化」。他建議，「黨對於任何作家都不予以『資格』保證作品的權利」¹¹；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得加『編者按』，給群眾以先入之見」，「絕對禁止匿名批評、適合於自己企圖的『讀者中來』、甚至偽造的『讀者來信』」¹²。胡風的這些建議，都有其具體的針對性。如建國初期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批判，《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化名讀者李定中，在《文藝報》1951年第4卷第5期發表《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一文，指斥《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等小說是「一種新的低級趣味」。《文藝報》加的「編者按」則肯定讀者李定中的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創作傾向的「危險性」。胡風對類似這種由刊物作出的「定性」很反感，他認為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有在討論中才能逐漸明晰，而刊物應該採取一種「中間」立場，而不是成為權力話語的傳聲筒。

胡風的文藝思想和編輯思想，在當時被判決為「反馬克思主義」。胡風提出的有關同人刊物的建議，被視為是要取消黨對於文藝運動統一領導的原則，使文藝運動成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動。從出版文化的角度看，胡風在解放後的悲慘結局沉重地反映了同人刊物在當代中國的

命運。據牛漢回憶，邵荃麟在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說，解放後的刊物，沒有一個超過《七月》、《希望》的，而邵荃麟是從《希望》創刊後就一直對胡風進行嚴厲批判的文藝理論家¹³。

二

清理「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理論家、作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不可能進入公眾領域討論。政治權利對精神文化處於絕對支配地位，此起彼伏的鬥爭、批判浪潮，構成了一種深刻不安的輿論環境，文學創作、學術探討、思想交流等等，很難毫無顧忌地自由進行。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所作的主題報告中強調了知識份子的進步性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接著，毛澤東又提出了「雙百」方針，鼓勵文人學者進行鳴放。隨後，文藝界領導部門鑒於文學刊物和文學出版中存在的問題，召開全國性的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研究和部署如何貫徹「雙百」方針，以利於提倡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競爭。「會上周揚講話中講不要怕片面性，他說，你一個片面，我一個片面，加起來不就全面了麼（毛澤東在後來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反覆批評了這個觀點）。同時，周揚提出可以考慮允許辦同仁刊物，他這個講話影響很大，後來文藝界不少人準備辦同仁刊物。」¹⁴中國作協則緊鑼密鼓地開展整風鳴放會，剛調任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原由周揚兼），廢寢忘食地工作，主持各類會議，到各有關單位、刊物編輯部談話。作協的整風很活躍，提出了不少理論問題和工作中的問題，其中包括辦同仁刊物，不贊成全都是機關刊物。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氣象中，一些知識份子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也浮出歷史地表，同人刊物被認為是打破權力話語的束縛，催生文學、文化多元化發展的一種載體。不難理解，胡風當年的聲音在大鳴放中產生了「迴響」，邊緣話語成為曇花一現的亮點。

1957年5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鳴放中最為活躍的法律系四年級女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師生集會。她發表長篇演講，胡風問題成了主要內容之一。她說：「我過去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胡風提出要辦同人雜誌，現在看來很正確。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是對的，因為現在的文藝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嚴重。……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¹⁵林希翎的演講在北京高校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她成了新聞人物。反「右」鬥爭開始後，林希翎即被《中國青年報》稱之為「她的右派言論在一個時期內在全國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中十分盛行」，媒體對她的「反動言行」作了「強有力的回擊」¹⁶。

與林希翎的「鳴放」類似，舒蕪在1957年5月26日《文藝報》發表的《關於改進文學刊物現狀的一個建議》中，他建議允許辦同仁刊物、同人出版社。從一種理想的文化生態出發，他說：「可不可以這樣理解：讓全國文學刊物合成一個『百花園』，而有些刊物每一個只是一種花。這樣，才能期望『一個刊物辦得好，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才能使各個刊物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互相競賽，共釀春榮。」針對當時文學期刊面貌雷同、定位模式化的現象，他提出要打造有自我個性的期刊，「這種刊物體現『百花齊放』，就是有意識地只放某一種花，有意識地只提倡某一文學流派，不合於刊物宗旨的作品，就是不登。」基於共同的文化

信念，「這種刊物的編輯部，必然就是由同一流派的作者自願結合而成，一身二任，自無矛盾。」他希望同人刊物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輻射力，能夠在探索中逐步壯大出版力量，「這種刊物當然是同人性的，倘有條件，不妨同時興辦小規模的同人出版合作社。起初可以只出一個刊物，以後慢慢擴大，也出書。可以同人集資，也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定期償還。這種同人性的出版合作社的好處，與同人性刊物略同。」這和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提出的建議毫無二致。舒蕪被打成了右派。提倡同人刊物，攻擊文藝界黨的領導等罪名羅織其身。這個「胡風餘孽」，還是未能躲開政治風浪的衝擊，和一些胡風分子一樣，踏上通往勞動改造的曲折道路¹⁷。

辦同人刊物真的是要脫離黨的領導嗎？非也。在一個社會文化和諧發展的環境裏，各種刊物應該多元並進、交融互補，滿足文學、文化多樣性的追求。同人刊物雖然可能囿於門戶之見，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形成「小集團」，但它作為期刊百花園中的一種，自有其存在價值。當年在《文藝報》編輯部的敏澤回憶說，他們也曾有過辦同人刊物想法，而這種想法是在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文藝界領導也一再公開提倡可以辦同人刊物的情況下萌發的。他們試圖提倡革命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更好地尊重藝術的特點和規律，從而更好地發揮革命文學的政治社會功能，並和那時文學上流行的越來越多的背離藝術特點和規律的不良傾向相抗衡。敏澤等人把可否辦同人刊物的想法向馮雪峰徵求了意見，並「向作協當時的領導人作了詢問，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答復……但我們此時還是想到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指責，為了防止別人指責我們脫離黨的領導，我們一個非黨群眾也不吸收；我們要根據黨的方針辦；並且要在黨委領導下工作。」儘管如此，「這個遠遠沒有成為行動的、經過當時領導人批准的打算和一些議論，不久就成了彌天的大罪！」¹⁸敏澤和馮雪峰等人一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跟敏澤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江蘇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譯家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等，也試圖探索辦同人雜誌之路。這些人在1957年6月初發起組織《探求者》文學月刊社，他們不過是有此願望，並沒有成為事實，就因為反右派鬥爭而中止。方之、葉至誠後來回憶，當年「受到了黨的雙百方針的鼓舞，毛主席《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傳達報告，又促使我們去思索生活中的新問題，例如，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人們的精神面貌和關係的調整，正確吸收外國經驗和探索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史達林的悲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等；當時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危害性也已暴露出來，使許多有識之士感到疾首痛心——這一切，使我們感到不能再老一套地寫下去了，迫切想打破公式化、概念化，力求有所創新，大膽干預生活，於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籌辦《探求者》文學社團和刊物。」¹⁹「探求者」只是一個剛具雛形便遭來滅頂之災的文學社團，實際生存期僅一個月。他們有一份表明觀點的「啟事」草稿，起草者高曉聲，又有一份「章程」草案，執筆者為陸文夫。後來，「啟事」和「章程」作為供批判用的材料被公布²⁰。

對「機關刊物」提出質疑，是《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發出的聲音之一。它對當時一些文藝雜誌的辦法，表示很不滿意：編輯部缺乏獨立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特別是在藝術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出它們的藝術傾向。《啟事》認為，這是用行政方式來辦雜誌的必然結果。用行政方式辦雜誌的缺點在於它是「官辦的」，儘管申明並非機關刊物，但是卻擺脫不了機關刊物的性質。《啟事》在概述了機關刊物難免的缺點之後聲稱：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啟事》提出了自己

在文學方面的主張：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今天看來，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兵器一樣，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各種創作方法都可以運用。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

為了追求刊物的特色，為文學發展提供獨異的話語空間，《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明確提出：「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²¹「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²¹這種編輯原則，雖然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貫徹、實施，但其探索性、異端性，與主流話語規範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探求者」的言論，遭到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康生說它「有組織、有綱領、大搖大擺公開活動」，意即它的形態比較完備，活動面較廣。姚文元更是連篇累牘，事後發表了好幾篇批判文章，指斥它的「反動文藝思想」²²。《新華日報》則為此發表了社論，接著《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不滿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的現狀，不滿意社會主義革命的現狀，不滿意共產黨領導的現狀，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甚麼東西的原因。」²³「他們既然不滿意現狀，當然只能探求到現狀的反面去。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離開共產黨的領導，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二者必居其一，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識。因此，他們所謂『打破教條束縛』，就是要打破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所謂『大膽干預生活』，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制度；所謂『嚴肅探討人生』，就是否認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他們所謂『探求』的實質。至於所謂『促進社會主義』，也就是要把社會主義『促進』到他們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標去。」²³這一場批判的結果是：陳椿年、高曉聲、梅汝愷、曾華被劃為右派分子，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的處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²⁴。

在反「右」之後日益激進的文化思潮中，不僅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被放逐，就是文聯、作協機關刊物的處境，也是舉步維艱。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對文學藝術作出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²⁵在接踵而至的整改中，大批刊物失去了生存的條件。到「文革」時期，出版機構癱瘓、撤銷，編輯隊伍下放勞改，絕大多數期刊被迫停刊。截至1969年，全國期刊只剩下《紅旗》、《新華月報》、《人民畫報》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國》、《北京週報》、《中國文學》等20種刊物。「這僅存的20種期刊，不僅比建國初期的1950年（出版期刊295種）的數量少275種，而且也是近百年來中國期刊發展史上全國期刊出版量的最低點。」²⁶極「左」思潮的不斷演化，給文學、文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災難。精神產品「一體化」的生產機制，最終在嚴酷的文化禁錮中達到極致進而趨向解體。

註釋

1 胡喬木：《文藝工作者為甚麼要改造思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頁1。

- 2 丁玲：《為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鬥性而鬥爭》，載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
- 3 胡風1949年4月26日致路翎信，見《胡風全集》第9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50。
- 4 梅志《胡風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619。
- 5 《胡風全集》第5卷，頁347。
- 6 胡風1952年8月25日致王元化信，見《胡風全集》第9卷，頁565-566。
- 7 綠原：《試叩命運之門——關於「三十萬言」的回憶與思考》，見《胡風三十萬言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7。
- 8 [韓]魯貞銀：《關於「胡風編輯活動和編輯思想」訪談錄——訪談牛漢、綠原、耿庸、羅洛、舒蕪》，載《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4期。
- 9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見《胡風全集》第6卷，頁411-412。
- 10 同註9，頁419。
- 11 同註9，頁423。
- 12 同註9，頁420-421。
- 13 李頻：《胡風的編輯生涯》，見《大眾期刊運作》，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頁414。
- 14 黎之：《文壇風雲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2。另據郭小川1969年7月14日寫的極具「文革」特色的書面檢查——《向毛主席請罪 向革命群眾請罪》，郭小川痛陳當年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是一個「黑會」，「這個黑會的中心問題是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級政策，歪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取消了刊物的無產階級立場，拋棄了無產階級政策」，「用『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代替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用編輯部的『學術空氣』和『各樹風格』『高稿費』等腐蝕編輯人員和年輕作者」。作為這個會議的具體主持者，郭小川說：「在會議準備期間，（1956年）9月初到9月中，我曾到上海、武漢兩地訪問了不少資產階級作家和教授、幾個刊物的編輯部，回京後寫了一個所謂『資料性的材料』，集中了他們的錯誤看法，提出了在刊物上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全面意見，這些意見就成了編輯工作會議的重要根據。在開會後，《開幕詞》是我致的，周揚的兩次黑報告是我催促他來做的，會議通過的文學刊物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綱領——《會議紀要》是我起草的，會議期間舉辦的『五四』以來的文學刊物展覽會是我組織的。我在會前會後做了多方面的活動。實際上，我幫助周揚通過這一黑會使全國的重要的輿論陣地——文藝刊物進一步成為資產階級復辟的工具，為1957年的右派向黨倡狂進攻準備了條件。這個黑會的影響是很惡劣的，流毒是很廣泛的。」在另一份檢查中，郭小川說：「我在準備和實際主持這個會議的指導思想，就是不要無產階級立場，不要無產階級領導，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毛主席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更不讓工農兵登上文藝舞台，而讓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切牛鬼蛇神，來個群魔亂舞，這樣，當然就是使全國的文藝刊物都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陣地，使全國文藝刊物和報紙文藝副刊成為資本主義集團競爭的反革命工具。我自己還想自己辦一個同人刊物，這所謂同人，不僅包括李興華、楊犁、蘇中、塗光群、楊志一這些人，而且還想拉林默涵、樓適夷等等一起辦，後來，只因為林默涵從文藝黑線的全局考慮認為不需要，而應集中力量辦好已有的反黨喉舌如《文藝報》等等，才沒有辦出來。」（參見郭曉惠等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頁229-230、頁213）
- 15 鄭伯亞、丁寶芳：《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載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報》。
- 16 顧行：《強有力的回擊》，載1957年6月24日《北京日報》。
- 17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74。
- 18 敏澤：《帶著歉疚的回憶》，載《北京文藝》1980年第4期。
- 19 方之、葉至誠：《也算經驗》，《文藝報》編輯部編：《文學：回憶與思考》，北京：人民文

- 學出版社，1980年，頁24。
- 20 陳椿年：《關於「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兼評梅汝愷〈憶方之〉》，載《書屋》2002年第11期。
- 2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載《雨花》1957年10月號。
- 22 同註20。
- 23 社論：《〈探求者〉探求甚麼？》，載1957年10月9日《新華日報》。
- 24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90。
- 25 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草稿上所作的這一批示，於1964年7月11日作為正式檔下發。
- 26 方厚樞：《「文革」十年的期刊》，載《編輯學刊》1998年第3期。

陳偉軍 1973年生，男，湖南湘潭人。1998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導師為程文超教授。曾在南方日報社工作多年，為該社主任編輯。現任教於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並在職攻讀暨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導師為蔣述卓教授，專業為文藝學，研究方向為文學與文化。與人合著《文人心靈的歷史回聲——〈白門柳〉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參與撰寫《新時期文學的敘事轉型與文學思潮》（程文超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欲望的重新敘述——20世紀中國的文學敘事與文藝精神》（程文超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碩士論文被收入國家「十五」重點圖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續編）·文學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四期 2005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四期（2005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